

论魏晋南北朝风俗演变及趋向

陈华文

提要 本文在分析魏晋南北朝鲜明的时代特征及独有的特性基础上,从整体角度去把握和论述这一历史时期风俗演变情况及其特征,揭示了其习俗所表现的独有的发展个性,风俗演变的趋向以及此期叛古、趋时、突变、殊异等的明显特点,显示了这一特殊朝代风俗所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处于大动荡状态而使一切都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风俗进行过研究,但那往往限于这一时期的具体习俗——即个案的研究,忽略了这个朝代更替频繁,以及南北对峙、等级森严社会的背后同样存在具有共性的习俗和历史的趋向性。本文试图从魏晋南北朝整体角度去把握和论述它的风俗演变情况及其特征,从而揭示魏晋南北朝习俗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具有鲜明个性,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价值。

魏晋南北朝起自公元220年曹魏立国至公元589年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历时369年,其中由于民族迁徙,政权交替更换,它的民族和文化交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频繁和活跃的,因此,此期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性。

首先,政权更替频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朝代更替、国家易姓频仍时期,从三国开始到隋朝统一,三个半世纪中,在整个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先后建立过30来个不同的政权,长的一二百年,短的只有数年,皇帝象走马灯一样地轮换。频繁的政权更替,带来了政治阴谋、谋杀、篡位以至战乱和动荡,极大地影响甚至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极大的冲击。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思想便是当时士大夫视政权更替为家常便饭而形成的特有观念,否则人们便很难立身处世,服务于不同的政权。

其次,门阀制度处于黄金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期,可以说都是在门阀制度

的阴影下生存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极其完善,但也开始走向僵化,使品评乡党人物不重才能只重门第,高门势族掌握着政权和国家经济及政治走向,寒门庶族受到严重排挤,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畸形政权结构。正是这种在门阀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权,由于它的个性——即势族的特权被过分强调,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强大的、连续不断的与政权不断更替正好相反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姓氏等级制、婚姻讲究门阀出身,即士庶不通婚以及其它的特权、等级观念等方面。尤其是南北朝之后门阀制度绝对化,九品中正制衰落,成了例行的公事,已不再重要,士进完全讲究血统,人们辨别姓氏,防止士庶混淆,谱牒学极其发达,在用人时重视的只是先人的名位等等。这一切与门阀制度密不可分,成为当时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流。

第三,民族处于大融合时期。

所谓“五胡乱华”,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在迁徙和战争中先后进入中原,在晋朝统治者内部争斗时,利用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大都建立在原来汉民族传统聚居区,从而加强了异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和改制,使鲜卑族的汉化不断加强。尤其是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之间建立婚姻关系,对于民族的融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从十六国到北魏统一北方一直到北魏分裂被北齐、北周取代,民族间的杂居和融合便是社会发展的主流。由于各民族间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生产方式的不同,给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抉择机会,尤其是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加速了其学习、变异的速度。许多旧的文化样式被淘汰,

而许多新的文化样式则被创造、被流行。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碰撞、交流、学习,异彩纷呈的时代。

第四,宗教兴盛。

不断变更的政权、战乱,使人民生活动荡不定的社会之中,人生、命运、朝代、政权,如变幻的万花筒,瞬间即逝无法把握。人们为寻求解脱便浸淫于宗教信仰,企望得到神的启示和来世的幸福安宁,即使是统治者,也非常明白利用宗教来治理平民百姓,使他们能从无常的生命感受中得到神不灭的心理平衡,这无疑推动了宗教信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发展,成为道教、佛教传布弘扬的兴盛时期是有其自身道理的。道教讲究修炼服药,认为修炼服药可使人成仙,长生不死。因此,从魏晋开始,服散成风,隐居修炼成了一种崇尚;而佛教则渲染极乐世界,那些脑满肠肥,荣华享尽、坏事做绝的人只要立寺造像布施财物便可立地成佛、往极乐世界,对于统治者士大夫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凿石佛、建寺庙一时大兴,敦煌、云岗石窟倒成了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也是当时统治者佞佛的见证。而这一切又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过节增添了浴佛、盂兰盆,人死要做斋七、百日等,受佛教影响,梁朝时小到正月初一吃一只鸡蛋的习俗也被改掉,原因是不茹荤。

第五,南北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另一方面来源于民族族源,而其中不同政权的建立以及人为的隔阂是南北差异形成、加大的重要原因。东晋与十六国的对峙,主要的差异是民族政权的不同形成的,南北朝时期,当时南方轻薄奢淫,北方则斗狠劫杀^[1]则是主要趋势。试想,在优游的生活和玄谈风气的影响下,能不轻薄奢淫吗?而在弱肉强食,倡导武功的影响下,又岂能不斗狠劫杀?其实,南北差异是多方面的,它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极其明显的碰撞和交锋,如裤褶与袍衫,茗饮与酪浆,席地与胡床,骑马与乘车等等都显示了南北差异,是政权的差异,有时是政治的差异。这种差异后来都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成为南北多彩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习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按照自身的规律生存、发展、变异,并形成自己的历史个性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历史背景的大趋势,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的发展和演变。

二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大致是承继了秦汉的主

流而不断发展形成的,因此,大部分风俗习惯的内容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痕迹,证明它们的传承关系。但是,正像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一样,风俗习惯也表现出自己独有的发展个性,尤其是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替、统治者自我标榜的正风辨俗等等原因,使魏晋南北朝的许多风俗习惯义项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对隋唐之后风俗习惯的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因此,下面几个方面的风俗演变趋向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风俗习惯在民族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发生演变,这一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是最明显的,而研究汉民族风俗在此期的演变更不得不注意此点。虽然从主流上来说,是汉民族风俗对少数民族风俗在演变上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许多义项上,由于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而对后代产生久远的影响;如踞坐胡床,它不仅是坐具的改进或变革,更深远地是它改变了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席地而坐的习俗,从而在礼仪、观念方面带来一种革命,为后来的椅子的产生提供了思维支点;又如胡服,即裤褶之类,这种满裆裤和更合体的服装,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更适于劳作也更适于行伍。所以,胡服首先从军队中盛行开来。而胡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麻饼或芝麻饼,则盛行二千年而不衰。另外在婚俗、音乐器具、节日习俗等方面都有相互促进而使风俗习惯趋向变化的。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因吸收历史教训而使风俗发生演变的。如胡服便是因为战争需要从赵武灵王开始采用的,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争频繁,所以盛行开来,并成为居常服饰,后来发展为朝服。神灵信仰也是如此,如郢城城隍虽然它的作用是源于某种神奇的传说,但从心理角度上看,客观存在仍然是民众的一种基于现实生命财产需要的经验,所以,传奇积淀着历史教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晋南北朝的薄葬。历史上厚葬总是被盗墓者挖掘,暴尸荒野,尤其是魏晋时,眼见战乱使汉氏诸陵无不被挖掘,引起人们对厚葬弊端的反思。曹丕曾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2]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从曹操开始的曹氏皇族提倡薄葬,一些权贵大臣也纷纷响应,后来形成了在历史上少有的薄葬高潮。

再次,具有时代特征的士庶分明的阵营使习俗也带上鲜明的时代个性。门阀制度的发展制造了大批凌驾于平民百姓,甚至当时出身低微的皇帝之上的势族。他们自我封闭,不与庶族发生联系,因此,使此期的习俗许多演变为畸形的禁忌。如在交往中士庶不同

坐,太后之孙路琼之拜访王僧达,王不仅语言傲慢,并且将琼之坐过的床烧掉^[3],而这仅仅因为路出身庶族。又如士庶不通婚,为了不外嫁庶族,不惜中表结亲^[4],甚至将庶族认为“非类”^[5]拒绝结亲等等。在家族乡里等习俗方面,也是以势族占主导地位,因此,权贵名士的风俗行为,对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像谢安兄弟居丧不废乐,虽然是违犯古礼的,但“衣冠效之,遂以成俗”^[6],可见对习俗的演变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这种士庶分明而使习俗产生演变的主要心理依据是,士族占有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民众产生依附、仿效的行为。

第四,奢华的风俗趋向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源于当时贵族追求标新立异;一方面是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促使人们安于眼前现实,及时行乐;还有一方面则是人性的弱点,即攀比消费。三者的结合,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奢华或为一种时尚,不仅衣饰要华丽高贵,坐车娶别致新颖,而且饮食也要精良细味,居室高屋大户。难怪周朗要感叹“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7]简直是不得了。但是,其根源则在权贵和士族自己没有带好头。魏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比赛,而是一种崇尚奢丽的畸形社会风气的展示。北魏时的元琛在竞夸富奢之后曾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过我。”^[8]也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延续。正是权贵的斗奢竞丽,施及民间使风俗古今大异,所谓“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9]从这种竞相奢丽的习俗演变中我们可以见出习俗的等级性在淡弱的趋势。

第五,崇尚玄学,自任放达,所以习俗也常常朝着怪诞或叛逆的方向演变。魏晋时,许多人为了避祸,常常沉醉于酒精之中,以常醉不常醒来摆脱当政者逼官或挑剔言论而罹祸的可能性。有些喜欢追随风气的人便酗酒成风,怪诞不经。由何宴开始的服散是为了强身健体,后来士族仿效成风,竟有市人当街称石发,令人绝倒。居丧饮酒食肉,观棋娱乐或居丧不废乐,制做凶门柏历等等,使风俗出现剧变,并逐渐形成新的习俗,对后世产生影响。

第六,由于社会原因而造成魏晋南北朝时许多人及时行乐、醉生梦死,因此出现了许多颓废不经的风俗,表明风俗习惯也有可能是在人的驱使下朝着陋俗方向演变。这种颓废的风俗主要表现在女置面首左右,自以为是男女平权(不过从男女平等社会看来,男人

多妻妾同样是不合理的)。而男人则寻求畸形的性刺激,大兴妾童之恋,甚至官私不分,影响身分和人格。另外,男子傅粉,在贵族子弟中,从魏晋到南北朝一直未绝。曹魏时的何宴是“粉白不离手”^[10],梁朝时贵游子弟也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审美畸形。凡此种说明,颓废风俗也是魏晋南北朝风俗演变的一个方向。不过,当人们认识清这种习俗的不可取之后,便逐渐消亡。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不管怎么演变,有一个大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风俗朝着更加适宜于生存的方向发展。战乱、动荡的社会和政权的快速变更,使这一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实效和现世功利目的,一句话更接近于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这种变更许多时候也被旧制度的维护者所默许。像婚姻礼仪、衣饰风俗、社会崇尚等等都是如此,而且有些内容还对后世形成巨大的影响,成为后来长期实行的民俗义项。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由于历史、政治、思想观念、社会崇尚、民族融合、战乱和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此期叛古、趋时、突变、殊异等明显特点,成为中华民族风俗发展史,尤其是汉民族风俗发展史中具有特色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对隋唐及其以后的风俗发展演变匡定了一定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1. 叛古

叛古是对古礼的挑战和遗弃。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民是最讲究拟古的,言必称古是那些卫道者最常见的手段。而风俗习惯皆有由来,它们或传之古远,或承继前代。但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或民众往往因时势,或吸取教训而人为地改变,使风俗习惯在很多时候背古俗而行之,形成叛古的特点。他们或改变旧俗,或另立新俗,使旧有习俗走向衰亡。如南北朝时佛教影响大增,人们为了信仰上的原因,在饮食习惯方面作了许多调整,不吃荤成为时尚。在梁武帝的提倡下,正月初一原本要吃一只鸡蛋的习俗被取消^[11]。薄葬是此期叛古的另一个热点。这在自古以厚葬为主流,以厚葬来表达人们对死去亲人的情感,以厚葬来检验和展示人们的孝道的社会,若无大的变故和真正勇气和决心是很难决绝地去实行的。但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薄葬证明了时人对厚葬危害的认识和背弃古俗的勇气和决心,虽然在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厚葬已抬头。再如男子傅粉,这虽然太过脂粉味,但以之为美,且与整个社会趋势不合

拍,则证明它是一种与传统的要求相背离的时尚。尚白色的情形也是如此,当时人穿白衣,戴白帽,乘白车,以古人的丧色为时尚,形成一种与传统服饰完全不同的礼俗,更可知也是背俗而行。又如魏晋时崇尚放达,在生活上不拘礼俗,更是对传统现实的挑战,他们喝酒下棋吹箫弹唱,以个人或群团行为挑战传统文化。“惠帝元康中(公元291—299),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12]则更是对古礼的背叛。这些甚至连冠也不戴,衣服也不穿的人,怎么也难以与循规蹈矩的人相提并论。而婚姻举乐,居丧不废乐,都是古俗所不允许的,此期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然是叛古的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山阴公主逼面首左右之事,而且不是一人二人,而是30人,后人皆以为是淫举,殊不知从本质上却是一种叛古行为。若从要求男女平权角度看,帝王可以嫔妃成群,则女性为何不可?凡此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不拘古俗并常常叛古而行的习俗现象。而且,许多时候叛古不是一人的现象,有的甚至影响后代,成为常俗,如婚礼举乐、薄葬等等。

2. 趋时

趋时是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的又一个特点。其实每个朝代的风俗习惯都有趋时的特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主要原因是面对不同的政治需要,除了趋时自保以适应环境,寻求活得更自在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其它途径。它表明风俗习惯总是与社会历史大背景是相一致的,不可背离。

魏晋南北朝风俗习惯的趋时特征,主要是指它们更符合现实要求的结构,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崇尚往往演变并固定成为一种风俗,一是风俗习惯更接近现世的实用性。

崇尚本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被锁定,并且在被更多人所趋附、在现实生活中被重复,则往往演变固定而成为一种风俗习惯。如魏晋时权贵斗富竞相奢丽,后来演变成了无数争奇斗艳的奢侈风俗,它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的各个方面,所谓“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13]指的便是这种现实。魏晋时崇尚服五石散,散发时极其痛苦,需宽衣旧衣才能使皮肤不被磨破,因此,那些名士服散者不得已的宽衣大袖,竟成为天下人仿效的对象,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潇洒放达,终于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宽衣大袖貌若神仙的衣饰风俗,所谓“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14],便是其明证。另外,南北朝时佞佛成风,人们便创造形成了斋七、百日、浴佛节、盂兰盆节等习俗样式。官民信鬼神成风,便创造了各种神祇并修建大量寺庙以供大家祭祀。凡

此,都是崇尚而成为习俗的例证。比如当时耕牛通借的习俗,它也是一种政令,目的是为了保证因丧乱缺乏耕牛而不致贻误农时。所以,它既接近于现实,又具有直接的目的性。宋明帝忌古来为丧家之色的白色,其实隐含着的是惧怕变乱的实用性政治目的,是一种本质上的懦弱。在婚姻上强令婚配是为了战乱而大量衰减的人口得以迅速繁衍,它与拜时妇、三日婚嫁习俗一样,是一种为了现实目的而采取的特殊方式,目的性非常明确。至于宽衣大袖源于服散的特殊原因,裤褶之制是为了穿著更合体更舒适;姓氏等级门阀制度是为了保证穷族的特权、地位;神灵信仰是为了人们的心理获得平衡满足和政治需要;胡床的盛行是为了人们坐的更舒适等等,这些习俗有的改进、有的吸收,目的都是为了更具有实用性,或者从根本上说更接近现实,更符合人们的生存需要。而归根结蒂,作为文化的风俗习惯,目的就是为了使生存于其中的种群具有归属感和活的更自在、更快乐。

3. 突变

突变是相对于渐变而言。风俗习惯有一个特征就是传承变异。传承指的是它在族群中不断被重复。但习俗的重复不是原样画葫芦的一成不变,在许多习俗的细节上往往因时因人的条件而异,所以,习俗大致总是处于变异之中,只是这种变异,常常是一种渐变。而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除了渐变之外,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战乱、政治需要、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时尚等原因而使风俗习惯发生急剧变化,并成为此期习俗传承的特点。

习俗的突变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旧有的习俗被彻底改造,成为一种相近或相似但又不同的习俗主体;第二种是在原来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习俗主体。前者是突变的正常形式,后者是突变的独特形式。

造成魏晋南北朝风俗突变的第一种形式,主要是战乱、民族迁徙融合以及历史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等等原因。尤其是战乱和民族融合给习俗突变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比如薄葬便是基于战乱使陵墓不断被挖掘的现实而改变厚葬形成的,在这里战乱中盗墓暴尸原野是人们吸取教训使习俗突变的最直接目的。而胡坐、裤褶则是民族交融的直接后果。胡坐改变了汉民族自古以来的席地而坐也改变了人们的坐具;裤褶则改进了传统的袍衫之制,使上衣下裳的衣饰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对男人,则更为彻底。另外,冠式变为巾帽,铠甲变为两裆而外穿,不仅是历史的发展、人们观念改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出于对现实实用的需要。至于上巳节被固定在三月三,乘马改为乘车,甚至乘马车改为乘牛车,都是此期鉴于实用和各种条件限制

而形成的习俗。它们有的由时间不固定为固定,有的由甲种变为乙种或乙种崇尚变为甲种崇尚,完全改变了原来习俗形态,突变而为新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习俗突变之后,许多旧有的习俗往往被淘汰或失去主导地位。

魏晋南北朝风俗突变特征给习俗带来另一个后果,就是产生许多新的习俗样式。如重视生命意义的生日习俗;体现信仰价值的斋七、百日风俗以及建筑上的寺庙佛塔之式,节日里的元宵、浴佛、盂兰盆会等等;体现民间俗信的凶门柏历和乡贤祭祠以及创新的商业集市、庙会习俗和生产中的借牛等等,都是因为社会、生产、信仰等等需要而产生的新的习俗,它不仅映衬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习俗突变的特点,大都还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些至今仍在传承。

4、殊异

殊异是指习俗的差异性特大。殊异之所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习俗的特点,乃是因为当时政权割据,南北长时期分裂分治地相对峙以及地理环境不同或民族共同体不同等原因造成的,五胡乱华及南北分裂是最主要的原因。顾炎武说当时南方轻薄奢淫,北方斗狠劫杀指的就是南北分治后最主要的区别。

殊异表现在许多方面,北方重牧业,南方重农业,这是指生产方面的大的区别。表现在外在的衣着打扮方面,情形就更明显。当时汉民族以束发加冠来固定自己的发饰,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则披发、辮发,在衣服方面,除了传统的袍衫之外,则盛行袄子、裤褶、蹀躞带等所谓胡人的打扮。鞋子方面南方盛行穿屐,北方

则盛行穿靴。饮食方面南方是稻谷鱼鲜,北方则菽麦牛羊。北魏时许多南方人投奔到北方或到北方做生意,由于饮食上的差异而自成集市,号为吴人坊鱼鳖市^[15],从中也说明南北饮食的殊异。饮食上的殊异还有一点是南方时兴茗饮(喝茶),北方则饮乳酪。王肃北投之后,出于政治原因竟称茗饮为酪奴^[16],两者的差异显然是绝对的。殊异还表现在交讌、婚姻、丧葬、礼仪等等方面。当时北方时兴乘马以代步,而南方则提倡乘车,尤其是乘牛车。南方婚礼是以“六礼”为基准,按传统方式进行。北方则“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数十人,随其车,迎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上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17]在丧葬方面,“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18]则民间哭丧南北也殊异。礼仪方面,南方人见面执手,北方人见面作揖。前者是一种创新,后者则是传统,可见南北殊异。

不过殊异仅仅是一时之特色,随着历史发展,南北殊异的许多习俗在学习交融中不断同化,到隋唐之后,许多已成为一体之民俗,不再有个性上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特征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些,比如讲究奢华,崇尚放达,追求怪诞以及土庶极其分明等等,都是此期具有特色的民俗个性。如果我们结合魏晋南北朝风俗习惯的演变具体地去寻味它们的特征,那么,我们的感受可能就会更深刻,也更全面一些。

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2]《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3]《南史·王僧达传》。

[4]《魏书·崔辨传》。

[5]《陈书·儒林传》。

[6]《晋书·谢安传》。

[7][14]《宋书·周朗传》。

[8][15][16]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卷二。

[9]《晋书·傅咸传》。

[10]《三国志·魏书·曹爽传》。

[11]宗懔《荆楚岁时记》。

[12]《晋书·五行志》。

[13]《梁书·武帝纪》。

[17]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篇》。

[18]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

(责任编辑 陈顺宣)